

郭良平专栏

跳出身份政治的漩涡

这是个身份政治的时代。在各国内部如此，在国际政治中也是如此。在主要发达国家推动下，国际上正在形成的最主要的身份分野，是民主与威权的阵营对决。威权主义已经取代恐怖主义，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大威胁；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认同这种分法，尤其在第三世界。中共极力否定这种身份划分，称其为“冷战思维”的产物，并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和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来取代新冷战前景。

然而中共最容易落入身份政治的漩涡，因为它是靠身份政治起家的——身份政治几乎是它的第二本性。关于区分敌我是革命首要任务的观点，毛泽东一直坚持到最后，贯穿他所有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——斗地主、划成分、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，文革中的“三支两军”、批斗“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叛徒、特务、走资派”，还有“臭老九”（知识分子）等等。他成也身份政治，败也身份政治。

身份政治是聚集政治力量的手段。它对摧毁一个旧秩序往往很有效，中共就是靠它发动和组织了广大农民，将他们由悲惨命运而产生的不满都集中到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身上，以此区分敌我；所聚集的力量成功摧垮了一个延续数千年的旧秩序，将中国社会夷为一张白纸，要在上面“画最新最美的图画”（毛泽东语）。

毋庸置疑，标签下面都有实际的利益冲突，但标签大大夸大了冲突的程度，制造了零和的游戏规则，掩盖了共同利益与和平相处的机会。这些标签，以及在政治斗争中花样翻新、层出不穷的其他标签，将活生生的人脸谱化、非人化，吞噬了无数生命，毁掉了无数人生和家庭，制造了无数暴力事件和人间悲剧。

20余年疾风暴雨的革命战争，使中共形成了一整套依靠身份政治的运作方式。一旦夺权，就顺理成章地用来画“最新最美的图画”，也就是说用摧毁一个旧世界的办法来建设一个新世界。对中共来说，这叫“别无他法”，因为它从思想理论、组织结构、权力分配和政治文化上，都是围绕着这个方法发展起来的。

这是个“运动型革命党”，离开了革命运动就不知所措。于是我们看到建政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：土地改革、三反五反、公社化、大跃进、社会主义教育、“四清”，还有由无数小运动组成的文化大革命。其间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代表党政官僚机构利益，希望建立一个“正常秩序”，按部就班地搞建设，却被毛泽东贴上“走资派”的标签，斗倒斗臭，刘还因此丧了命。最后毛不仅没有实现他的理想社会，自己也变成了孤家寡人，临终前的几年不愿见人，常常独自落泪。

中共的基因败部复活

改革开放以来，前有邓小平的“猫论”，后有胡锦涛的“不折腾”，中间有江泽民的“闷声发大财”，曾几何时，学术界也在讨论共产党从革命党到统治党的转型，似乎革命的年代已成过去式。但党的组织，尤其是基层组织，在失去传统功能后很快分崩离析，被市场的力量腐蚀得不像样子，腐败成了对执政党最大的威胁。

习近平为了挽救这个党，开展了一场长时期、高烈度的反腐和整党。他的目标模式似乎是延安时期党的状态：团结紧张、严肃活泼、有理想、朝气蓬勃、纪律严明、清廉、听指挥、具有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。他还强化了各级各地党组织的统治地位，将党组织扩展到市场化新开辟的领域——私企、外企、市场中介组织、宗教和慈善机构、民间团体等等，并重拾毛泽东的口号“党政军民学、东西南北中，党是领导一切的”。也就是说，他把旧的党建模式搬回来，并顺着它的逻辑进一步发展了它。

当然，共产党只有这么一个传统模式，任何整党的努力都不得不启用这个模式，并且在党内权力结构下很难有创新。经过十余年的努力，党的状况大大改善了，至少是在制度和组织形态上。但是这也召回了毛当时面对的问题，即用革命办法是否能成功地搞建设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只能实事求是地回顾一下毛时代的成败。

毛成功建立起一个能够保证国家统一、政治稳定、社会驯服的体制——就连文革那样的大动乱，也没造成国家分裂和动摇共产党的统治。计划经济巩固了党的地位，却缺少活力、效率、创新和企业家精神，这是社会主义输给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。到头来，毛既没有实现革命理想，也没有把经济搞上去——他去世时中国经济面临崩溃，继任者不得不改弦易辙。

目前的逆全球化，尤其是同中国脱钩的努力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这些国家之所以采取这种笨办法，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身份政治起了很大作用。中共的当务之急，是避免被定义，用崭新面貌来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而不是用旧瓶子来装新酒。

在计划经济时代尚且如此，如今的市场经济——而且是已经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，更让人质疑旧党建模式是否对路。

毫无疑问，这个模式能够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，但能否成就民族复兴大业则须要打个问号。且看目前的现实情况：左潮频频，“劳动人民”与“资本家”的身份政治不时甚嚣尘上，大批企业家、专业

技术人才和其他“高净值”的人群移民国外；地方政府大都丧失了创新创业的热情，干部大批“躺平”、不作为；形势主义和官僚主义盛行；知识分子噤若寒蝉；年度的“两会”越发没有看头；民间投资疲软，外企纷纷外迁；普通人对前景缺乏信心，在当局强调用消费促增长时，紧衣缩食又回到大众文化。中国的经济增长从胡锦涛第二任期的后期就一路下坡，再不像过去那样有落有升。更重要的是，人们似乎看不到新增长动力的出现，正在努力适应低增长的常态。

“不忘初心”导致国际困境

在国际舞台上，中共的传统同样使它容易陷入身份政治的漩涡。毛泽东的外交路线忠实地实行了马列的国际主义；参战朝鲜，支持全世界反帝反殖民的斗争和民族独立运动，以世界革命的领袖自居，到后来划分三个世界，搞反霸统一战线等。同国内一样，“斗争”是主旋律。现在中共在国内外形势的压迫下，很有可能回归这条路线。例如它已经在提倡毛式斗争精神，提出了“四个伟大”：伟大斗争、伟大工程、伟大事业、伟大梦想。

其中“伟大工程”是毛泽东在延安时用来专指党的建设（党建）的，是中共革命的“三大法宝”之一，也被习近平视为民族复兴的决定性因素。过去十多年，党建是习近平工作的核心。从2018年起，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急剧恶化。目前的很多困难都是外来打压造成的，原因主要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引起一些国家的恐惧；而恐惧原因之一，是他们认为中国在走回头路，回归那个他们打了40余年冷战才摧垮的共产模式。这些都同中共在“不忘初心”的口号下，有些盲目地回归正统息息相关。

中共虽然花了大气力搞“思想政治教育”，但真正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寥寥无几，包括党员干部。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增长和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毫无助益，它的阶级斗争和有关剥削、消灭私有制的理论还有很大副作用：吓跑老板，凉了知识分子，使许多干部无所适从，靠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来敷衍度日，苏联时期盛行的告密也在一定程度上回来了。这些都在使“西方敌对势力”更容易将中国描绘成苏联那样的“邪恶帝国”，为它们掀起的身份政治助力，为中共布下一个大陷阱。

事实是，今日的中国同苏联和毛时代的中国有着天渊之别，存在着大量同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双赢的机会。目前的逆全球化，尤其是同中国脱钩的努力，对谁都没有好处：提高了经济成本，降低了经济效率。这些国家之所以采取这种“杀敌一千，自损八百”的笨办法，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身份政治起了很大作用；它们利益不同，但在意识形态上高度一致。中共的当务之急，是避免被定义，用崭新面貌来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而不是用旧瓶子来装新酒。这须要创建一个新的、更能反映中国现状的、能同世界正常交流的话语体系，以便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同。

但困难的是，中共领导层只熟悉旧的话语体系；虽然也试图创新，但程度远远不够。相反，旧传统正在侵蚀改革开放的成就、武装社会的不满情绪，再加上毛时代遗留下来的势力，这些都在拉着中国往回走。这么走下去的结果，西方国家肯定不喜欢，中国年轻一代也未必喜欢。意识形态的两个极端——传统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，都有系统理论来支撑一个完整的话语体系，而中国现状所处的中间地带，则是理论的荒漠。

这就是中国长期陷入左右之争的根源。广大群众对两者都不信任，但又缺乏理论、概念和词语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和理想。这是理论界和社科界的失职，但也不能全怪他们，因为他们都处在权力结构的下层，附在同一张皮上，当局又在狠抓意识形态，使他们缺少创新空间。当局本身，正因为“当局”，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来创新，于是很难避免被他们的过去——他们成长起来，形成世界观的过去——所支配。

没有足够的理论创新，中国在国内外都会面临日益盛行的身份政治的困扰。它在国外正被归入“邪恶轴心”（包括俄罗斯、朝鲜、伊朗和其他对现状不满的国家），在国内文革的烈火有可能复燃。旧式党建的最终结果，很可能是救了党却“亡了国”，使民族复兴大业大打折扣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